

序 一

张济顺

2020年5月,石川祯浩教授发来电邮告知,中日中国当代史工作坊(以下称“工作坊”)论文集遴选工作进展顺利,将由东洋文库于明年春天出版。在新冠疫情肆虐全球的日子里,听到这样的好消息,既令人激动,亦颇为感怀。

作为亲历者与受益人,历时八年多的中日中国当代史合作研究已成为我学术生涯的珍贵记忆。曾记得,由杨奎松教授领衔的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当代史研究中心草创时期,在学校的支持下,策划与启动了几个重要的国际合作项目,2012年起,每年一届的中日工作坊便是其中之一,且持之以恒,日久而弥新。

自二十世纪初梁启超倡“新史学”起,现代史学在中国揭开序幕,中国近现代史亦步亦趋,迈进史学殿堂。伴随着当代人治当代史的争议与诘问,前辈史家锲而不舍,上下求索,经过近半世纪的建构,中国近现代史被学界公认为史学研究的一个分支,列入史学主流的范畴。然严格说来,彼时之“中国近现代史”,至1949年停步。在中日学术交流空前活跃的1980年代,两国的中国近现代史学者逐步形成一种共通性反思,即突破“以中共党史为纲”的中国革命史主流叙事的藩篱¹,重建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范式与学科体系,但现今所论的中国当代史还未跻身此列。在西方汉学界,1949年以后的中国历史名著绝大多数出自政治学、社会学家之手,鲜有历史学家的踪迹。至上世纪最后十年,当代中国研究打破社会科学的一统天下,进入历史学科畛域。中外一批治史者,尤其是年轻学人,又一次“越界”,开启了新一轮的“当代人治当代史”的史学之旅。

1 参见,毛升:“石川祯浩谈日本的中国现代史研究”,澎湃新闻上海书评,2020年4月5日,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6835554。

1990年柯伟林(William C. Kirby)教授发表的关于1943-1958年的国家经济计划及其运作在中国大陆与台湾连续与变化的开拓性研究成果,打开了重新发现与解释1950年代中国的研究之路²。当代中国史从“新”、“旧”中国的截然两分转而探讨整个二十世纪乃至更长时段内历史的延续与断裂。帝制终结的191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1949年、改革开放的1978年,近百年中国这三个最重要的时间节点所具的历史界分意义,已被提升到再思现代史十分醒目的位置。久保亨教授在他主编的《一九四九年前後の中国》一书总论中,曾概要地介绍了上世纪末到本世纪最初几年日本、欧美、中国大陆与台湾研究的新进展,并提纲挈领地“从‘连续性’与‘非连续性’的四个视角,——‘作为帝国的中国’、‘作为近代民族国家的中国’、‘一党专政与社会主义’、‘超越帝国、民族国家、社会主义’,寻找1949年革命的历史位置³”。

然而,由于无须赘述的原因,对跨越1949年的中国历史学者来说,“显学”与“险学”似乎是这个年轻的学科与生俱来的特征。而对日本历史学者而言,固然不存在“险学”之忧,但中国当代史研究亦非坦途。调阅档案与实地口述采访及田野调查中遇到的障碍,或许更甚于中国学者。

所幸的是,本世纪初,各国、各地区的档案资料放量开放,日记、书信、小报等民间史料海量发掘,资料的品种日益增多,编纂主体的多元化,数字化整理工作日新月异,急速发展,为原本“粮草”匮乏的中国当代史提供了多层次的丰富史料源⁴。与此同时,中国当代史受到新文化史、全球史等各种西方史学理论潮流的浸润,社会史与超越东亚的区域

2 William C. Kirby,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Modern China: Economic Planning on the Mainland and on Taiwan, 1943-1958,”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24 (1990): 121-141.

3 久保亨《一九四九年前後の中国》,东京:汲古书院,2006年,第3-17页。

4 参见,村田雄二郎:序言,东洋文库超域亚洲研究部门现代中国研究班主编:《展望当代中国研究——档案资料的内与外》,东京:东洋文库,2018年。

史研究尤为兴盛。曾被宏大革命叙事替代或模糊的地方图景逐步凸显，久被湮灭的人群与看似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登堂入室，基层社会的实态被层层叠叠地揭示出来，通过不同视角与问题域的中观和微观研究，中国革命、现代国家建设、社会结构与文化的变迁获得了重建史实与再阐释的可能性。中国民族国家也被置于现代东亚与全球秩序的脉络之中，开始显现出非国别史的区域史意义。

在此基础上，经中日学林同好一番精心擘画，标以“中国当代史”的共同研究在象征着思想传统与人文情怀的华东师大丽娃河旁，落下了第一笔。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现代中国研究中心、东洋文库现代中国研究班先后作为日方东道主，石川禎浩、久保亨、村田雄二郎、深町英夫、小滨正子、中村元哉以及小野寺史郎等先生组成了日方主持运作团队，每届 10 篇左右报告的小型工作坊在上海、京都、东京三地轮流举行。八年来，中日双方 130 余人次与会，共提交了 81 篇论文。这次呈现给读者的论文集，由中、日双方各择 10 篇，重在挑选中青年学者的研究，都是以简体中文首次发表。

工作坊从“1950 年代的中国”起步，逐步拓展论题，撑长时段，对中国当代史进行多方位的探索。本书以“集体化时代的中国”为论述之经纬，上溯民国政治与中共革命，下至后毛泽东时代，既有关照同一主题的深入对话，也不乏各有取径、大异其趣的新论。纵览全书，择其中若干议题介述于下：

其一，集体化时代国家强力渗透下乡村社会的复杂面相。本书收入的三篇论文从民众史的角度，改变以往“政策 - 响应”、“控制 - 反抗”的单向度叙事，展现社会主义的地方性，并揭窠中共运作机制各层级之间的矛盾性。从统购统销、合作化运动到人民公社的集体化“全盛时期”，既有“远离共产主义热情的”中农、富农，以“损失最小化”的算计，尽力避免粮食征购定量过高的风险，主动积极加入初级社（松村史穗）；也有参与“闹退社”行动的皖西北贫雇农、中农，与地、富、反、坏一样，被扣上“现

行犯”的帽子,受到严厉的“社会主义规训”(满永);还有“无罪”与“有罪”一念之差而自杀的“四不清”干部,瞬间由凌驾于乡民之上的掌权人沦为“政治贱民”(刘彦文)。集体化时代的这些民众史个案,既“自下而上”地揭示中共革命的阶级划分、阶级斗争与历史实践之间的巨大冲突与张力,亦“自上而下”地反映毛泽东与中央的权威指令在地方层层加码、折冲与衰减、同构与变异等叠合交错的复杂因素。

其二,毛泽东时代的历史遗产及其持续性效应。在人民公社解体之后,集体化时代究竟是一段可以“告别”、不再重现的过去,还是一笔有资源与经验遗产的存史?田原史起教授通过甘肃麦村社会主义治理经验的重新整理,表明:集体化时代积累起来的社区共有财产(生态性资源)、社会关系资本(象征性资源)及其互相循环,在村社企业等“标志性资源”相对匮乏的中国西北部农村至今仍然受用。毛时代品牌制造的一些成功案例,部分地纠正以往对中国计划经济体制的刻板印象。郭子健博士以河北地方酒“刘伶醉”的品牌化为例,讲述1970年代一批地方“小茅台”名酒的创牌故事。这些以地方传统老窖命名的外销名酒制造,一方面得益于1950年代政府主导下“茅台”等名酒试点为代表的跨区域技术流通,地方酿酒工艺渐成可复制的技术;他方面则是1970年代中央财政、外贸权力部分下放的成效,“内销服从外销”的外贸策略也为提升地方酒的层级带来政策便利。这则“小茅台”诞生记显露出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缝隙效应与变通性因素,至今仍如雷贯耳的中国名酒品牌实则绕不开毛时代的创造。

其三,由民国史解析社会主义时期的中国宪政。国、共两党在各自执政的时期,分别于1946、1954年召开国民大会、人民代表大会,制定了第一部宪法。冷战结构下东亚与日本盛行的偏见,断言两者无延续性可言。中村元哉、深町英夫/张玉萍教授的两篇论文,分别对此提出质疑。中村认为,国民大会与人民代表大会固然有直接选举与间接选举之别,但两者均有总统/主席独裁的相似性。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只是效仿

苏维埃,也不是全盘接受苏联法学思想,其理论来源,一则可追溯到“德意志和传统中国这两大因素”,二则与西方自由主义法学理论在民国时期的引入与传播有承续关系,即使在毛时代的中国也隐藏着“一段接纳的艰辛历史”。深町 / 张玉萍围绕满族代表争取议席问题,比较国、共两党政权的选举实践。国民党委托满族协会作为民族团体选出代表,导致身份认同复杂的满族内部更趋分裂;共产党则是在自己领导下促使其选出代表,满足了该民族内部身份识别的多样性。从表面上看,同样将少数民族列入代议制,中共的对策优于国民党,但实际上,这种“由下而上的民意表达,更能灵活、现实地自上而下的控制、操作”。如深町回顾中国议会史时所述:百年中国议会、选举的历史迂回曲折,屡试错误,至1949年以后,中国的人大、政协制度“奇妙的安定”,而能够稳定确立的“唯一体制即为共产党的党国体制”⁵。

其四,冷战视野下的国共较量与个体生命史。朝鲜战争与美国第七舰队协防台湾,东亚冷战铁幕由此拉开。未在朝战中出一兵一卒的蒋介石政权却意外地成为朝鲜战争“下半场”的隐身主角并坐收“战果”⁶,占志愿军战俘三分之二的反共战俘,拒绝返回大陆而赴台,为台湾取得中国“合法政府”地位提供了政治筹码。然而,交战双方中朝与美韩,却出于各自政治考量,淡化或回避这段历史,使得被各自阵营扼住的数万名战俘长久地失声。收入本书的常成博士的论文,梳理重现九名反共战俘领袖惊险的叛逃过程,还原了战俘谈判桌后一幕幕残酷的灵肉搏斗的生命故事。冷战时期的国共较量也在日本的华侨社会激烈展开。陈来幸

5 参见,深町英夫:序章,氏主编《中国议会百年史》,台北: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19年,第21页。

6 常成博士在其志愿军战俘问题的研究中提出了“两场韩战”的概念:上半场是“为领土而战”,从1950年6月25日战争爆发至1951年11月27日“军事分界线”最后划定;下半场是“为战俘而战”,从1951年7月停战谈判开始,一直到1953年7月关于战俘遣返问题协议达成,结束战争,持续两年之久。参见,常成《真实的历史、真挚的灵魂——于劲与「厄运」》,于劲《厄运》新版跋,香港:天地图书公司,2020年。

教授以华侨学校问题为主题,解剖日本华侨社会面临国共两方势力角逐的政治生态及政策选择。台湾当局利用其与日本有邦交的“正统地位”与分配资源的特权,对侨校实施制裁、分化、诱导等各种政策,各地侨领与侨校虽采取不同的对策,与台湾的关系也错综复杂,但留日华侨中倾向大陆的左派仍占优势,且多数是台籍华侨。这两项研究提示我们,东亚冷战不只是上层外交、政治博弈的国家政治史,亦是重塑社会与个体生命的底层社会史。

其五,中日医学交流与毛泽东时代抗疫及农村医疗的政治史。在全球史潮流影响下,中国医疗史亦有“全球转向”(global turn)的研究新路向。超越民族国家与领土疆界的疾病与抗疫、环境与公共卫生政策、中西医跨界流动、药物流通等课题不断有新成果涌现,毛泽东时代的医疗史也是工作坊引人注目的议题。在中国宣布“一边倒”、拒绝西方文化与科学流派的1950年代,中日医学交流却通过民间外交的渠道依然活跃。饭岛涉教授经过悉心整理与解读1955-1957年间日本医学专家三次组团访华带回的珍贵资料,发现这几次交流对中国传染病防治政策起了很大作用,特别是1956年小宫使节团建议的日本住血吸虫病对策,左右了中国对该病的防治策略的方向,并与农业发展纲要的爱国卫生运动及人民公社化一起,极具政治色彩。日本传染病学家大鹤正满1957年的访中日记,记录了这个“政治敏感时期”许多重要的细节与即时感观,“上传下达”的行政系统与社会动员在传染病防治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尤其令他印象深刻。作为一个日本专家,他又敏感到这种组织同战前与战时的日本卫生组合活动相类似,不过“更强大”。他也非常想一探“中国没有一只苍蝇”的宣传之虚实,周恩来务实坦率的回答,让他对这位中国总理颇有好感。日本医学专家还发现,当时在中国医学界,占主流的仍是“英美派”,不过,接待他们的几位中国医学专家陆续在反右及以后的政治运动中受到迫害,也使他们感受到中国医学的政治症候。另两项研究呼应了日本专家的记录与观感,与土改运动紧密结合的农村医疗服务引

入(福士由纪)、消灭血吸虫病“中间宿主”钉螺的群众运动经验(顾维方),彰显了毛时代社会主义国家的强大组织力与动员力,也传递出“六亿神州尽舜尧”⁷的民族国家的浪漫想象。若以“后见之明”观之,这些中国经验既有特定历史与政治条件下的独特性与不可复制性,又含有跨越国界的经验借鉴,并具有溢出时空界限的全球意义。1950至1970年代中国农村医疗系统在几十年后作为初级卫生保健(primary health care)的“典型模范”广受国际赞誉,并得到许多医疗史研究者的重视,便是例证。

除上述议题外,中共接管天津时期工厂劳资关系的处理、“五反”运动前后展开的资产阶级家属工作,分别是李国芳、冯筱才教授对建国初期新执政与资产阶级关系的探讨。胡悦晗博士把视线移至工厂内部,分析文革中期三线工厂内部精英群体的行动策略。丸田孝志教授与大泽肇博士分别论述乡村民间信仰与“革命传说”的巧妙结合、江苏松江地区农村教师群体的构成,展现1950年代初期农村文化习俗与教育的政治新气象。大学教育改造与革新是邓阳博士与陈钊博士的兴趣所在,前者考察著名的教会大学燕京宗教学院在中国的最后岁月;后者研究1949-1964年中国大学教育中的特殊课程——政治课的建设。滨田麻矢教授以宗璞的《红豆》与李翊云的《市场之爱》两部小说为研究文本,比较1949与1989年人民解放军两次进入北京给年轻中国知识分子带来的不同记忆,讲述小说的女主人公经历重大历史事件后所做出的个人抉择以及多年后各自对此所作的反思。

当2019年第八届工作坊在华东师大结束时,曾约定来年冬天再会东京。谁也没有料到,第九届工作坊将隔空举行。这是临时的便宜之计,还是意味着后疫情时代常规交流方式的开启,我无法确定。但无论

7 毛泽东在读1958年6月30日《人民日报》登载的江西省余江县消灭血吸虫病的报道后,写下《七律二首·送瘟神》中的诗句。

是认识自我,还是追寻父辈,无论是解密他者,还是比对近邻,中国当代史对中日两国学人无疑都具有魅力,吸引着工作坊勉力前行。

谨以此书献给工作坊所有的组织及与会者。特别让我们心谢不已的是日方主持团队近十年的精心运作与倾力支持。也以此书告慰先后辞世的武上真理子、袁广泉两位老师,他们的热忱、辛劳与奉献,我们永远铭记于心。